

叶成林 李蓉 著

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国共合作在抗日战场

叶成林 李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共合作在抗日战场/叶成林,李蓉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098-3262-2

I. ①国… II. ①叶… ②李… III. ①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史料

IV. ①K265.1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8191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鹏

复 审:韩冬梅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263 千字

印 张:19.2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3262-2

定 价:35.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目 录



中国到了或存或亡的严重关头 / 2
中共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 / 5
中共的军事合作思想 / 12
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 15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 / 26
平型关战役中的合作 / 41
忻口作战中的合作 / 48
娘子关作战中的合作 / 54
组建新四军军部 / 59
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设立办事处 / 61
相互派驻高级联络参谋 / 78
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需供给 / 86
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 93
政治部第三厅鼓舞士气的工作 / 96
徐州会战中的合作 / 101
反攻太原中的合作 / 111
朱德指挥东路军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 / 119
合作取得“晋南大捷”的胜利 / 130

合作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 / 137
武汉会战中的合作 / 144
敌后游击战场同正面战场的战略配合 / 152
中共帮助国民政府军提高游击战水平 / 173
国民党第14军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术 / 185
合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 188
国民政府军组织的敌后游击战 / 192
八路军提供日军密码电报本 / 198
新四军在随枣会战中的配合作战 / 200
1939年冬季攻势中的合作 / 204
百团大战和国民政府军的配合 / 213
骑兵第2军同新四军彭雪枫部的合作 / 222
八路军对中条山战役的配合 / 224
八路军、新四军对第二次长沙会战的配合 / 233
八路军、新四军对其他战役战斗的配合 / 237
国共在华南战场的合作 / 257
豫湘桂战役中的配合 / 270
共同救护遇险美军飞行员 / 273
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 286
参考文献 / 291
后 记 / 304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各阶层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就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成果。

周恩来曾在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国共实际的合作，是从军队开始的。”^①国共军事合作奠定了抗日统一战线的一种格局，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毋庸讳言，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是有磨擦甚至是十分严重的磨擦，但合作是基调，是主流，双方都没有公开表示合作破裂。本书所考察的是双方在军事方面的合作。

国共军事合作是立体的，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考察，可分为战前的合作和战时的合作，战争谋略的合作和战争展开的合作，战争展开中的战略、战役和战术各个层面的合作，有战斗的合作，还有军事情报、军队训练、政治工作、后方勤务等方面的合作。

① 转引自王淇、王秀鑫、刘振起：《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处编：《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

中国到了或存或亡的严重关头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在交涉持续进行时，日军于7月8日晨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9军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事变的远因，可以追溯到明治以来的日本大陆政策”^①。日本的大陆政策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大陆，进而侵略全世界的侵略计划，是日本长期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

日本的大陆政策的制定，是日本所谓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们共同逐步完成的。

丰臣秀吉（1536—1598）是“日本近代帝国主义的急先锋”^②，是日本提出对外扩张理论、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的鼻祖。1592年5月，丰臣秀吉提出：（1）宜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都（北京），呈献都城附近十国与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其中下位者将增十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2）大唐国之关白（相当于中国的宰相），授与秀次，并与都城附近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Ⅲ页。

②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之百余国，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择一人任之。（3）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子）或八条宫智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弟）继之。（4）高丽国由岐阜宰相（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秀家统治。（5）天皇居北京，秀吉居日本，船来泊之宁波。^①

佐藤信渊（1769—1850）1823年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实行计划：“我国而欲制他邦，必先以并吞支那为始。”“十数年间必能平支那全国，鞑靼支那既加统一，应更施以产灵之法，除万民之疾苦，到处营造神杜，祭我皇祖诸大神。……苟能奉行天意而无间断，则全世界皆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悉隶臣仆，自不俟论。”^②

中江兆民（1847—1901）1887年提出征服中国的措施：“颁布一张诏书，募集举国壮丁，此时，至少也可得四、五十万人，倾国库之财，至少可买数十上百艘军舰。士兵去、商人去、农夫去、工人去、学者也去。士兵负责打仗、商人去做买卖、农夫去耕田、工人去做工、学者去任教。把该国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割取过来为我国所有，我们将成为大国！”“我皇上亲率中央军，由水师提督某某，某大将、某中将、某少将伴随护卫，乘坚固无比的某舰渡海，乘我某路军之大捷而奠都于某地，新建宫殿，结构极其宏伟壮丽。数层楼阁，巍然高耸云霄。御林军环列，近卫骑兵围屯，构成皇帝的住处。因此，我皇上，乃我新大国的皇上。”^③

福泽谕吉（1834—1901）1894年8月呼吁：“要以文明之势力席卷四百余州，让四亿人民沐浴革新的阳光雨露，就必须做出决断，直冲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于文明之师面前。此非好战，乃是世界文明大势赋予日本的天职，是不得不为之也。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四百余州的全图尽在文明的阳光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

① 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检证》，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174页。

③ 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滕颖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36页。

辈翘首以盼。”^①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1887年制定《清国征讨方略》，提出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最理想的作战是以我海军击败敌海军，攻占北京，擒获清国皇帝。5个主力师团和一个后备师团在海军支援下，于直隶湾（山海关至滦河口之间）登陆，攻占北京。以常备师团和后备师团各一个，于长江口登陆，占领南京、安庆、荆州，以后成持久态势。”^②

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其中称：“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③

1935年日本陆军制定的侵华作战计划是：（1）对华北方面作战。在平津地方作战时，第7军（以中国驻屯军、关东军的一个师团及由国内及朝鲜派来的三个师团为基干）占领北平及天津附近要地。在山东地方作战时，第8军（以两个师团为基干）与海军协同，在山东半岛及海州附近登陆，占领青岛、济南、海州附近要地。根据情况，可合并第7、第8两军用于一个方面军。（2）对华中方面作战。第9军（以三个师团为基干）与海军协同在上海附近长江下游地区登陆，占领上海附近地区。根据情况，可由华北方面沿京汉线南下与之呼应，沿长江向汉口作战。（3）对华南方面作战。为保卫台湾并依据不割让福建条约之精神，必要时使用约一个师团的兵力，以主力占领福州，一部占领厦门，如需要即可占领汕头。^④

七七事变是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实施其大陆政策的重大步骤。其时，日本相比中国在经济力、军事力方面占着绝对优势：“日本当

① 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② 山本四郎：《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③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第270—271页。

开战之初，其陆、海、空军无论在质量上与数量上，均占绝对优势，不仅在乡兵员甚多，且训练有素，兵工发达，装备优良。七七事变时，其现役员兵虽仅38万人，但合预备役及后备役则为200万人，第一、二补充兵约为248万人，合计448万人。海军190余万吨。空军飞机2700余架。我国因工业落后，生产力薄弱，而兵役制度亦系初创，故军备远逊于敌人。战事初起之时，我国之总兵力虽为170余万人，但补充兵仅约50万人。海军11万吨，空军亦仅有战斗飞机305架（合各式机共600架）。我国因维护战时地方治安，需要多数部队，故陆军虽号称182个师之番号，但作战初期预定可使用于第一线之兵力，仅为步兵80个师、又9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炮兵2个旅，又16个独立团而已。”^①中国已到了或生或死的严重关头。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不再退缩，中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了，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中国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民族精神团结起来了，为国家的生存奔赴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场，用鲜血和生命筑起捍卫中国生存的血肉长城。

中共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

国防会议是1936年7月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的，其职责是“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各重要问题”^②。蒋介石任国防会议议长，议员有阎锡山、冯玉祥等32人。

1937年7月底，蒋介石决定于8月6日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讨论和制定

①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国防部史政局1946年编，第2—3页。

②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第415页。

抗战的战略方针。8月1日，蒋介石令张冲急电延安，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大计。张冲还数次电询在西安的叶剑英，问毛、朱、周的行止时间。叶剑英鉴于张学良西安事变后被扣的情况，急电向中共中央建议：

“毛不必去，朱必须去。”^①8月2日，当时正在云阳镇红军总部出席红军改编问题讨论会的周恩来奉命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会，则偕秦邦宪、林伯渠去。8月4日，张冲复电：开国防会议。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南京参加。

8月7日上午，国防会议在南京举行。蒋介石致开会词后，参谋总长程潜说明国防会议原定在9月中旬举行，因敌人挑衅，发生战争，特提前举行，以便商讨制敌救亡大计。军政部部长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及处置情况。

8月7日晚，国民党中央最高决策人物和一些地方高级将领在南京召开国防联席会议，商讨抗日大计。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人、高级将领及地方将领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孙科、陈立夫、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龙云、刘湘、张治中、黄绍竑、程潜、朱培德等41人到会。会上，蒋介石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致开会词。他说：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今天召集全国各地高级将领长官开会，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会上各军事将领热烈讨论了抗战及抗战战略问题。龙云、冯玉祥、刘湘等都力主抗战。会议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以起立表示抗战的决心。会议还决定，在未正式对日宣战以前，与日本正式交涉，仍不轻易放弃和平。

其时，中共中央拟定了《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认为：“根据敌我一般情况之分析及敌我战略之基本方针，应确立对日作战原则如下：（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

①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编写组编：《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为原则；(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箝制敌人；(5)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任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地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地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

(6)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

(7)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①据此精神，中共中央于8月4日致电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对当时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华北战场战略部署和红军参战后的战略任务等重大问题提出系统方案以贡献于国防会议。中共中央的电文是：“国防问题我们意见如下：(1)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2)第二防线保定、大同、马厂、潍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3)至于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只顾此线而不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4)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5)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6)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7)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8)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

① 《中央文件汇集》1937年下册，第317页，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9）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犹豫是必败之道。”^①

8月10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一行抵达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将所准备的提案提交会议。提案内容包括国防会议组织机构案，重新确定战时编制案，确立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确定华北抗战计划案及红军担任一方面独立作战的任务、实施全国人民总动员及武装民众参战计划案等。

8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谈话会。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分别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就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及指导方针详细阐述意见。周恩来发言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指出企图在外交上寻求妥协途径，“欲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日军撤退平津，我军退出河北）此是不可能之事”。外交拖延办法只可便利“民众动员及一切军事准备，但不可动摇抗战决心”。只有“坚强决心，整个部署，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得最后胜利。”第二，指出“作战方针上为展开黄河北岸之抗战，则交通运输有被截断之可能，故第一第二战区须培养可独立持久之能力，因在华北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之扩大运动战，正面防御不可依赖一线及前线之阵地。”要“用游击战术，交通大道则坚壁清野，在其侧面山地则不退。”应速派员“组织敌后民众”，派军事人才对民众进行指导，“用于山地及农田地进行运动战”。第三，指出“动员方面能将一切部队列入序列为佳”。“预备军区即刻动员以从事各种准备，惟军区划分不必以历史关系，宜以每一军区可以独立于作战。”“编制利用北伐经验，为使运动战，轻便灵活，则采取三三制为例。”“全国政治工作方针依北伐经验而统一施行不利军队本身及民众之组织”。第四，“西北方面希望回民有一部分军队参加，以吸引民

① 洛甫、毛泽东关于国防问题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指示（1937年8月4日），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54—55页。

族之抗战。”^①

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他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②

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的“政策、战略”问题的发言。叶剑英首先对中日战争中的敌我力量、国际因素以及战争的发展进程，作了分析和估计。他指出：我之战略重点若放在上海方面，即使取得胜利亦不能扭转全战局：如果将重点放在平绥线，则可转移全战局，并能破坏敌人的整个计划。战争将是持久的，我们不仅要动员国内力量，而且要大力争取国际援助。对战略与战术关系问题，叶剑英说：“虽战略上持久，但战术上仍应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战略上虽采取内线，但战术仍应取外线，随时包围敌人。故，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广大民众之运动战，以此三原则以行作战。”叶剑英在发言中，还谈到武装民众、政治工作、粮食补给以及创办专门刊物，介绍中国抗战及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西班牙抗战的经验等问题。^③

中共代表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方针、对出席会议的各位将领后来的作战指挥，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① 参见庄明坤、邹明德：《1937年8月11日南京谈话会简述》，载《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5、6期合刊。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476页。

③ 《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会议经过深入讨论,确定以“持久消耗战略”作为中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即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敌我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曾任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的陈诚在其《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一书记述说:“日本因蓄谋侵略,整军经武准备有素,在军事上较我国远为优越,故其作战方针在发挥其现代化之军事威力,谋迅速歼灭我野战军,并攻略我若干重要据点,予我以精神上之重大打击,迫我屈服,以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日本作战指导,始终遵循是项方针。”“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有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此项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国军作战指导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一期,国军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力,藉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①

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撤销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即日,蒋介石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作如下表述:利用我方优势之兵力与广大国土,采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战斗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二)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就任陆海空军大元帅;(三)设立国防参议会,由汪精卫任主席;曾琦、李璜、左舜生、张伯苓、胡适、傅斯年、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勱、张东荪、沈钧儒、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等23人为委员;(四)为了加强军事指挥,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作战区域为河北和山东北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作战区域

^①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7—8页。

为山西、察哈尔和绥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初为冯玉祥，后蒋介石兼任，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作战区域为苏南和浙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副司令长官余汉谋，作战地区为福建和广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后李宗仁继任），副司令长官韩复榘，作战地区为鲁南和苏北地区。

8月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发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训令确定的抗日战争指导方略是：“1. 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之付托，统帅陆海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2. 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①

国民政府大本营在8月20日颁布的《第一战区北正面作战指导计划》中，对平津一带作战的指导方针是：“本战区北正面目前主要任务，为拒止敌人沿津浦、平汉两铁路南下，同时侧击敌人对南口方面之攻击，巩固南口万全之线，以策定尔后转移攻势收复失地之基础。”相应的指导要领是：

“为达方针前述之目的，应以平汉、津浦两铁路为轴心，以防守部队采纵深疏散据点式之防御配置，以机动部队控制于侧翼，如敌向我进攻，则协力于防守部队向敌侧背围攻而歼灭之，同时在前线之部队应组织便衣游击队，渡过永定河，深入平津铁路以东地区组织民众，破坏交通，以牵制敌人之运动。”战场兵力部署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指挥第67军、第29军、第53军、第91师、河北保安队为右地区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指挥第26路军、第3军、第17师、第2师、第25师为左地区队；第一总机动部队是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指挥的第10师、第83师、第85师。顺义县、固安县、雄县、河间县各西侧面相连之线，连线东侧右地区；昌平、紫荆关、阜平相连之线为左地区和总机动部队活动区域。第一总机动部队“以斋堂、大龙山一带为活动根据地，以策应昌平、南口、怀来方面之作战，截击敌之侧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3页。

面为主要任务”。八路军被编为第二机动部队，由朱德总指挥“指挥新编一百十五师、一百二十师、一百二十九师，以阳原、蔚县、涞源为活动根据地，以策应下花园、宣化、万全方面之作战，截击敌人之侧背，并须以便衣队深入冀东、热河地区，施行游击战，袭击敌军后方为主要任务”。另有第40军的第39师、第32军、第11路军、第23师和第47师为总预备队。^①该《作战计划》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吸收了中共“游击战”的思想，提出了要前方部队“组织便衣游击队，渡过永定河，深入平津铁路以东地区组织民众，破坏交通，以牵制敌人之运动”，还赋予八路军“以阳原、蔚县、涞源为活动根据地”，“须以便衣队深入冀东、热河地区，施行游击战，袭击敌军后方为主要任务”。游击战作为一种战法，已经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抗日战争的有机部分。

中共的军事合作思想

对国共军事合作，中共中央军委有系统的考虑，其完整的表述体现在毛泽东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中。

毛泽东从抗日战争的宏观大局、整体性出发，阐述了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的辩证关系、国共两党的分工，以及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相互配合的三种形式等方面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1）》，第614—616页。